

赫爾利大使的貢獻

「中國政治僵局」
的第三部份

(原文載一九四四年四月
廿日出版的美亞雜誌)

赫爾利大使的貢獻

「中國政治僵局」的第三
部份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四月
二十日出版的「美亞雜誌」

前兩期美亞雜誌上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討論，主要是論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無法達到某些協議的基礎，但是要分析一九四五年頭三個月的中國局勢之發展，如果對於這一時期中國政策仍舊難以解釋的變動，以及美國現在感到了自食其果的困難地位，沒有詳盡的考慮的話，就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分析。中國的形勢在一九四五年前是繼續不斷的危急，但是當時美國的影響經常使它尚有轉圜的餘地，但自一九四四年末魏特梅耶將軍和赫爾利代替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以來，中國的危機已發展到一個完全的和危險的僵局了。在這個僵局中，美國人民也一定曾遭受到痛苦。

美國對中國國內政治危機的關心是根據當前的和長期的考慮，從當前軍事需要的立場說來，顯然是要國民黨和共產黨軍隊的聯合力量應該動員起來，共同對日。美國與中國各方面作戰部隊的合作應該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障礙，史迪威將軍及其他美國駐華官員堅信可以而且應該訓練和裝備重慶政府的中央軍，使其在對亞洲大陸上日軍作最後的攻勢中擔任一個領導的角色。但是鑑於華北共產黨領導的

游擊隊所控制的高度戰略性地區，這些部隊也能够向在滿洲和朝鮮的日本主要的軍事和工業基地的政勢中起它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很明白的。可是重慶和共產黨之間繼續分裂，就使美國要給游擊隊以幫助感到困難，而繼續分裂對中國整個作戰努力起了有害影響，就更不必說了。

除了這種當前軍事上需要國共問題解決——這就會解除對游擊隊區域的封鎖，並便中國武裝部隊可以統一起來——點外，還有美國的長期利益，要求中國在戰後時期成爲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和民主的國家，因爲只有這樣的中國，才能使美國對遠東和平、進步和鞏固的希望有現實意義。當然，這些當前的和長期的考慮是密切的關連着的，因爲很明白的，中國參加戰爭的有效性不僅對於中國在解決遠東和平中起領導作用的能力，而且對於中國將來的團結和力量都會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美國在華的觀察家們——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久已認爲要解決中國國內政治危機只有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較開明的份子被給予決定政府政策的發言權才有可能，他們充分知道國民黨由完全控制着重慶官僚政治的右翼份子頑固地反對任何可能打破他們獨佔政權的措施，他們敵視共產黨的真正基礎是他們恐懼民主制度、土地改革、以及動員人民的努力，可是這些觀察家們也知道國民黨統治區內是有着反對現政權政策的自由派勢力的，而且應該鼓舞這些勢力去達到政府的自由化。因此，他們促請美政府採取積極的政策，以支持它在中國的目標和利益，而不要對重慶政權的反動政策和成見加以默認，不置一辭。他們的論斷是美國不必對中國主權有任何侵犯，而向重慶表示美國對中國在一個民主佔統治的政府下自由和進步的經濟之發展感到興趣，而且它充分同情國民黨統治區內一切有勇氣要求一個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一個土地改革的政治綱領的個人和集團，是完全可能的。他們相信美國爲了共同的作戰努力，用它的影響去鼓舞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就能大大的幫助中國成爲不僅在理論上

而且在實際上是戰後遠東和平和進步的主要力量。

在美國以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爲駐華代表，這一時期中，美國政策的方針就是依照這些總路線的。史迪威和高斯都相信應該而且可以幫助中國，使其在對日最後攻勢中起巨大作用的。他們兩位都明白共同爭論的基本原因，兩位都努力要使國民黨政策自由化，雖然還並沒有過任何徵象表示美國政府想用直接的壓力迫使改變中國政府的政策，可是已有大量的證據證明美國的官員希望說服蔣介石對於日益增長的改變重慶政權人員和行政積習的要求作某些讓步。

例如史迪威將軍會不斷促請中國一切作戰部隊應該聯合成爲單一的對日作戰力量，對游擊隊區域的封鎖應該解除，應該允許美國供給游擊隊以最低限度的裝備，以及應採取若干步驟在游擊隊區域建立空軍基地。在政治領域中，高斯大使也促請促進更大團結的必要措施之。

例如有一次據悉高斯先生向蔣委員長建議，作爲緩和人民不滿並提供統一作戰努力的基礎之一個方法，可以建立一個代議性的「作戰會議」，其中各黨派都將分担指導作戰的責任。

雖然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沒有達到說服委員長對日益增長的改變現政權的要求作任何具體的讓步，可是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即他們的努力使蔣介石相信美國政府不僅對中國缺乏團結表示深切的關心，而且它不準備對於有以犧牲美國人生命的代價拖延戰爭的危險的政策表示納悶，而不置一詞。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以何瑞德上校爲首的一個美國軍事使團終於被允許和華北游擊區域去，納爾遜在作了一個關於重慶和重慶周圍中國工業情況的嚴格批判性的報告後，受委員長之邀前去幫助建立中國戰時生產局，這是很有意義的。

華萊士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訪問中國時所表現的觀點也可以說明一個事實，即美國政府對於在重慶

那個不代表中國人民並奉行有害於我國和中國利益的政策的政策之存在，不能沉默，華萊士先生盡個在當時環境的所可能的明白，表示了美國人民願望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和民主的中國，並特別要求注意一件事，即：「任何國家除非其農業技術及其社會的農業部份是進步的和繁榮的，就不可能成為工業上健全而強大的國家」——這個聲明就可以很容易被解釋為對重慶以權經濟政策的一個直接的批評。

在整個這一時期，沒有任何徵象表示中國國內日益增長對重慶政權的反對，或者美國官員鼓吹改變重慶的專制政策的努力是針對蔣介石個人的，甚至批評統治集團取強烈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也繼續承認蔣是中國無可××的領袖，他們的要求是要他停止作為一黨的獨裁的領袖，而作代表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的首腦。同樣地納爾遜一九四四年夏、作為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首次訪問中國時，據悉他訪華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委員長說美國政府切望中國成為亞洲的領導力量，並且希望蔣介石能成為這個新的和強有力的中國的領袖，但是要美國幫助，首先使蔣介石在中國以及中國在亞洲達到這個地位，就必須要看重慶會不會來一個徹底的「打掃房子」而定。

當然，如果蔣介石認識到只有適應立即廢除一黨專政的要求，他才能希望仍舊成為「一個強和有影響的國家的首領」，能認識到這點，就會對解決中國政治危機以及美國與中國各方面的作戰部隊之間的合作問題邁進了一大步，的確，蔣已經表現自己為中國國內那些贊成獨裁和專制政府的集團之自願和能幹的代言人，但是大家還希望他政治的敏感和他仍舊想做中國領袖的強烈願望，也許會使他能夠適應這樣的事實，即民主勢力已經開始代替了封建頭腦的地主階級，而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因素了。

國民黨統治區的反對力量

上文所說的並不是要暗示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單方面有着促進重慶和平進行重要的改變的力量。若無國民黨統治區內部重要份子的強力支持，即使他們那方面的超人努力也不會有什麼用處，但必須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有而且現在仍有一種不斷增加的力量，這種力量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反對重慶官僚機構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這一點是不能過分強調的，這些反對力量中，除了國民黨內的下級公務人員、小商人以及更年青的軍官，但是他們的主要發言人却是中國民主同盟。這個團體是由那些已經聯合起來以支持立即擴大政治民主的要求之「小黨派」組成的，本雜誌曾描述過民主同盟（從前叫做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情形和早期歷史，但是一九四四年間，由於若干省份高級的軍事領袖參加的結果，該同盟的影響和盟員大大增加了，而且現在有證據證明該同盟與共產黨之間據他們的共同要求「即要求在十一月召開的國民大會以前成立有代表性的聯合政府」的基礎，可能已建立某種形式的工作協議，這兩件事實，使該同盟共有比前早期所享有的更大政治重要性。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該同盟曾發表了一個緊急呼籲，要求立即實行民主形式的政府，宣稱：「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需要，已經越過了理論的階段，這是一個事實……，民主制度的形成必不可延至戰後……，如果民主不在戰時實現，那麼戰後我們所得的將不是民主，而是我國的分裂與毀滅」。該同盟宣稱：在最近關於民主問題的一切討論，仍局限於「空話」，而「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多不勝數」，並力言國民黨應放棄它的特權及特殊地位，因為「一個真正愛國的革命黨派不能長此反對它自己人民」。

該同盟的聲明於詳細列明團結的急需，不僅足以加強中國抗戰力量，而且爲了贏得盟國信任，務會力言「國共關係必須按照民主原則加以改進」，並指出「中共所一再表示的意義，決未超過民主政治的範圍」，「國民黨正在進行的許多準備工作其目的似亦爲實現民主政治」，除此一主要要求外，同盟並要求採取當機立斷的措施，以應付經濟危機，此項措施包括裁撤腐化無能的官吏，勸員辭職，同盟體參加嚴懲囤積居奇與統治商品的工作，及幫助私營工廠獲得原料與燃料，以刺激生產，以代替「現時對各工廠存亡漠不關心的態度。」

這個聲明的發表，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內人民對政府拒絕予非國民黨各黨派以合法地位或不准非國民黨領袖在該國政府中有發言權的益加不滿，這一反對力量代表清各種不同的政見及經濟利益，但在國民黨政治獨裁制度這一共同要求上，却都能結合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時，中國民主同盟在昆明曾經頗爲自由地活動過，因爲該同盟會獲得雲南的政府主席龍雲的支持，除了龍雲之外，該同盟並得到若干其他省份軍事重要領袖的支持，這些領袖都對重慶政府政策有所批評，而且對它的戰爭領導表示不滿。在這些人中有李濟琛將軍（他是廣西的一位重要將領，現任重慶軍事參議院院長），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將軍，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將軍、鄧錫侯將軍（川康綏綏公署主任），甚至在四川（人們曾以爲中央政府在這一個省的影響極其強大的）像潘文華和楊森，（編者按楊森現任貴州省政府主席，他曾經批評國民黨中央系的軍隊不肯打仗，保存實力，但是他始終禁民主運動在貴州省的發展，對遵義浙大學生紀念五四實施戒嚴），這種軍事將軍已成爲積極批評政府的人，而且在一九四四年底在成都的報紙大部份社論不是批評政府就是要求民主。

該同盟與這些地方軍人的同盟，使某些外國觀察家懷疑因爲他們沒有把所有這些將軍弄成、

有希望。民主進步的擁護者，雖然他們支持該同盟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期望避免重慶的脆弱與腐敗，以期重獲自治統治者的地位，但也是一種證據，說明他們真正在關心着重慶軍事領導的脆弱與腐敗，這一點，可從下一事實得到証明：「一九四四年夏，中國東南部軍事領袖方面進行一個分離運動，以建立桂粵閩浙湘，（他們認為重慶不能防衛這五省）的東南聯防政府」。後來日本迅速攻佔這些省分，證明他們的看法——（按認為重慶不能防衛上述五省——編者）是正確的，據他們所說的，這個擬議中的制度之目的，是建立民主政府，更充分地與中國的盟國合作及實行一個民衆動員的真實計劃，雖然日本進攻迅速使這個計劃未能成爲確定行動，但是這却指出了中國東南部各指揮官是澈頭澈尾不滿重慶軍事行政的，而且他們認為假如中國將要積極參加盟國對日攻勢，就必須進行澈底改革，在主持這個分離運動的將領中有李濟陳將軍、薛岳將軍（湖南省主席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將軍（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所有這些將領後來都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以支持該同盟以聯合政府代替重慶政府的要求。

許多觀察家認為各省軍事領袖與民主同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同盟，可能在恰當時機成爲中國政治結構澈底改革的先鋒。升年來蔣介石力量的主要來源會是他迫使露骨的地方軍閥放棄各該省的權力及服從中央政府的權威，但是蔣介石所發展的中央政府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即各省的領袖只有依照蔣自己的條件方能參加政府，不然即完全不讓他們參加。升年前許多半自治省份的存在，毫無問題是擴大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但是依照一九四五年情形看來，一個更大的地方自治運動，民主可能具有一個聯邦制度的基礎，在這個制度裡面，可能代表更多的地方利益，譬如說這樣一種發展對於在性質上業已半自治的許多「邊區」納於中國中央政治機構內的道路能較鋪平，而「邊區」的參加對障礙

個制度的民主性質也會有很大的作用，況且這一分離運動，直至最近以前，其鋒芒是針對着重慶政治集團多過於針對蔣介石本人，因為目前尚是依然希望蔣介石會尋求適應於改革重慶獨裁政制要求的道路，從而成為可能出現的任何一種新形勢的聯合政府的領袖。

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提供了重慶政權的反對派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另一例證。紐約時報記者金王報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關於腐化、無能、鎮壓中國兵士低劣的待遇及這一切種種的其劣跡，從來沒有這樣尖銳地批評過，政府各部長中國各報紙，也從來沒有這樣充分地對其建立一個聯合政府的親名結束的辯論時，他的聲明激起了普遍地贊同的響應，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大公报評論道：「中國人民要成為具有立憲政府的民主國家的居民，以是之故，我們要求全國團結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

愛金生評論關於中國迫切需要的這一有力聲明時，提出：「在蔣介石改變政府的除阻滯政權的實質思想以前，中國不能期望根本的改進……，中國許多年來沒有發展到的公僕，是國民黨一個嚴重的恥辱，那些元老不僅是更老了而且越來越固步自封……，蔣介石現在勿須變更現行法律即能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他有足夠的權威與個人威望羅致未被承認的各政党的代表、民衆文化團體及無黨無派的政治人士參加政府。」

反對派方面另一行動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當時中國民主同盟會發表了一個抗日戰爭最後階段的三十六條綱領，這一綱領的主要點包括即刻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召開各黨派會議以成立一個臨時政府，並準備召集真正的國民代表大會，並制定憲法，保障人民自由，給予各政党以合法地位。

，並釋放政治犯，對全國各軍武器供應與訓練方面給予平等待遇，並施行一個統一的事務指揮，內閣祕密警察，廢除中營及「思想統治」等，很有興趣的，是民主同盟綱領以內明包括的各項要求實際上與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如周恩來在九四四年十月十日聯演中所總結的，以及以後兩黨於十一月重開談判時提交國民黨的各項要求是相同的。

正是在中國政治歷史這一重要關頭，史迪威將軍與高斯大使從中國被召回了，他們的職務便由魏特梅耶將軍與赫爾利大使所代替，在當時中美兩國政府方面，曾努力使世界得到這樣一種印象，即這種變動僅是人事問題，而新的美國的代表會繼續史迪威與高斯的傳統。

這一方方的解釋由於重慶政府以後所作的更動，包括免除應欽軍政部長、孔祥熙財政部長、陳立夫教育部長等職務的人事變動，似乎更加可信了，因為這三位官吏位列國民黨最反動的右翼領袖中間，他們的免職在某些方面，便被歡呼為蔣介石終於決定民主化其政權的顯然例證，但是這三個人繼續保持著在政府中具有極大影響的「地位」，更有經驗的觀察家頗認這一變動僅是希望緩和國內外評論所作的毫無意義的「裝腔作勢」，「值得注意的，是這後者的意見現在已證明是對的，陳誠將軍代應欽任軍政部長，曾被視為一最有希望的變動之一，他現在是毫無所作爲，因為一變數組織與行政管理的權力，依然留在何應欽手中，何應欽除了任參謀總長職務以外，最近又被任命為中國一切軍面部隊的總司令，同樣地宋子文作為外交部長的影響，亦日益不足輕重了，而王寵惠——蔣介石最親信的顧問之一——雖然名義上不是外交部長，實際上成為外交部長。

國民黨政策沒有改變

中國自由派人士也懷疑政府更動的價值，這可見之於昆明西南聯大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博士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對千餘學生的講演中，張博士在自由派人士中是很著名的一個，他是孫逸仙博士的早期追隨者，並有一個時期在教育部担任要職，他評論政府更動的演說中頗得注意之點是他對蔣介石的坦白批評，他的主要結論是解決中國目前危機的唯一辦法，在於大大限制蔣委員長的權力。張博士雖然承認政府的更動是表示蔣認識到人民對政府的普遍不滿，但仍堅持說，這種改變本身要達到政策上的任何基本修正是不夠的，不僅如此，他還說：中國風氣敗壞的責任，不在於國民黨反動首領，而要由蔣委員長本人來負。張博士雖充分承認蔣委員長對中國團結的貢獻，但同時斥責他把中國的福利服從於他個人的野心和建立其個人的政治機構——國民黨，斥責他力圖在中國人民面前把他自己偶像化，斥責他企圖統治思想與壓制批評。張博士勇敢也告訴他的學生說：蔣介石不應看作是不能批評的，他還強調說中國自由派人士不要期望國民黨自動改革，因為國民黨僅是蔣介石的私人黨派，並完全聽服他的命令。據張博士意見，過去數年中政府的政策清楚顯示蔣介石和國民黨日益的只注意一件事情——維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權力。

一般印象是內閣的變更並不預示國民黨政策的任何修改，這印象由於一九四五年頭三個月中的發展而更為增強了。這些發展表明蔣介石已強化他反對立即改革政治的要求，共產黨提出的召集各党派非常會議以建立代議制聯合政府的建議被直接了當地拒絕了，政府唯一的提案是給共產黨一二個政府職位，交換條件是把共產黨軍隊置於國民黨的控制下。這個建議對於共產黨是完全不能滿意的，因為共產黨不希望現在的政府中有它的代表，而是希望中國政府性質的真正改變。這種改變，將使各党派代表對決定政策有實際的發言權，並從而使聯合統帥部之建立成為可能。

對於中國民主同盟及國民黨統治區其他反對派，蔣介石首先企圖以語言（見蔣介石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告國民書）平息它們，即如果戰爭的條件允許時，將在本年內召開立憲議會，但民主同盟於二月十五日發表一聲明，聲稱，它的會員們並不滿意於這個保證。這個聲明指出：召開一個絕大部份代表是國民黨於戰前任命的立憲議會，決不能保證擬就一個值得人民充分支持的憲法或達到全國性的團結。聲明繼即重申該同盟於一九四四年十月發表的綱領的要點，聲言：「這些步驟必須在戰爭結束後實行，以便保證中國民主政府之可能性。」

蔣介石第二步是企圖以下列辦法削弱民主同盟，即給民主同盟主要的軍事上的支持者在重慶政權中某些重要位置，雲南省主席龍雲已被委為何應欽指揮下的中國一切地面部隊的副總司令，潘文華將軍已被委為四川省主席，另一位支持民主同盟的四川省的著名領袖楊森將軍，已被委為貴州省主席。但是現在還無象徵表明，這些手段已達到削弱民主同盟對重慶政權的反對的目的，成都與昆明各報的社論仍然繼續極力批評政府的政策，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據稱亦正在從事起草一爭取能够治理國事之聯合政府的最後綱領。現在住在雲南省昭平的李濟琛將軍據稱已得到閻錫山、潘文華、薛岳、劉文輝、余漢謀、龍雲、鄧錫候及馮玉祥等將軍重申合作的保證，自然這點並代表這些地方軍事領袖準備與重慶進行武裝衝突，似乎很明顯的，他們之擁護民主同盟的政綱，主要是由於他們憤恨中央政府控制他們各該省資源與人力的企圖，憤恨排斥他們參與政府的任何一份的企圖。但是他們同時誠懇地相信現在的重慶政權不能有效的指導戰爭並幸烈地不同意重慶政權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不僅有共產黨方面，而且有國民黨統治區各階層（除了地主官僚之外）對重慶政權的增長着的反對，但蔣介石最近的聲明，顯示他已較前更其頑固地決心維持國民黨獨佔的政權，什麼東西鼓勵蔣採取這種不安協的態度

目前？這當然不是由於中國內部力量的重新組合，因為有很多的根據可以證明對重慶的反對是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蔣介石之增長頑固性是起自赫爾利及魏特梅耶將軍到達中國舞臺之日，當然不是偶然的。只要略為看看這兩位美國重要代表所採取之態度即可表明他們對中國形勢之處理方法已引起政治危機的強烈化，於是批評頭一次公開的針對蔣介石本人而美國對華關係本身也達到了充滿潛在危險的僵局。

美國的困難

魏特梅耶將軍雖然是將軍，雖然是一個能幹的軍事領袖，但缺乏史迪威將軍對中國情況的深切的知識，而且他對於政治問題是趨向於採取極端保守的立場，而政治的保守主義應用於中國時，就很容易變成支持極端反動的份子，但是違背了史迪威將軍與高斯大使所倡導的有希望的政策——這一政策曾表示了美國是贊成以民主方法解決中國國內的分歧——的主要責任，必須由赫爾利大使負之。

赫爾利大使到了中國來，他過去調整互相沖突的利益爭執與糾紛是富有經驗的，但他顯然沒有具備解決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所必備的知識，這些是基本的問題，民主對獨裁、封建制度對現代經濟進步，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是不可能妥協的，不能有這樣的東西，如像折衷的民主或部份的人民的自由或其於古代的和壓迫農民的土地制度之上的強大的現代化的經濟，但赫爾利大使不能認識這個事實，結果他不久就以爲中國共產黨之拒絕與重慶「妥協」是不合理了的，例如他不能理解共產黨爲什麼不願意把他們的軍隊交給國民黨指揮，他仍認爲蔣介石之辯稱沒有一個政府能够容忍有一個獨立的軍隊之存在是合情理的了，於是他客客易易的屈服於蔣介石之主張，說亞洲的主要危險是「赤色危險」。

說對共產黨作任何讓步是無權和危險的，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應該嚴格只限於給重慶政府，赫爾利之採取這種立場，顯然是得到魏特梅耶充分之支持。魏氏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宣稱他沒有得到權力給中國共產黨戰士以援助，並稱已訓令在華的一切美國軍官，不要幫助那些不屬於重慶政府的個人或團體。赫爾利大使在上月返美國討論對華政策之後，對於這一政策解釋得更清楚，例如他在四月二日與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強調這一事實，即美國在華政策是致力於幫助中國軍隊的統一，而這是一個總的目標，就使得不能扶植或幫助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除非他們變成國民政府的軍隊底一部份，他辯稱美國以武裝裝備共產黨是等於承認在中國有另一個政府，他並且說如有武裝的政党和軍閥力足以抗禦中央政府的一天，中國就一天不會統一。

這些主張表示他完全忽視了大家共知的事情，即中國的「國」軍只是國民黨的軍隊，而中央政府則只是一個「武裝的政黨」，故其要求共產黨放棄其軍隊指揮權，而國民黨獨裁政府却依然存在時，是叫他們接受解散其作爲一個政党的。據說赫爾利大使會對華盛頓的一群人這樣描寫中國共產黨軍隊：他們是一個政治團體的會員，我來這樣說——好比我們共和黨員武裝起來，在美國一個政党如有聽其指揮的武裝力量，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又是不能想像的，但中國不是美國，很可以問問赫爾利將軍，如果美國軍隊是完全歸民主黨所獨自指揮，而共和黨人之作爲一個政治力量之繼續存在的唯一機會是在於他們擁有武裝力量，那末他對共和黨之武裝起來將感得如何，赫爾利大使顯然是把美國駐華大使館及美國軍事觀察家多年來來的觀察和研究所得的結論完全拋棄，他接受了蔣介石的謬誤的說明，認爲中國的問題是共產主義與國民黨思想間之問題，而不是把中國的問題看成民主對封建之問題，他堅持謂只有毫無保留的支持現在政府，才能促進中國統一，顯然是忽視了國民黨之內很有力的力量。

曾經繼續要求民主的統一與近代經濟制度的發展。

赫爾利大使與魏特梅耶將軍所採取的態度，必然使蔣介石深信美國政府已確定的對重慶政府作了約束，不會再加壓力於重慶，要其對任何反對黨派讓步了，使蔣介石對於共產黨及對於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反對派，採取強硬態度，也正是這個保證，這是很少疑問的。例如蔣介石在三月一日的演講中，他明白的表示其決心反對在三月召集國民大會之前成立任何種聯合政府之要求，「我們在以前的『美亞雜誌』曾經指出這一個要求是基本的要求，因為問題之關鍵在於中國政治的前途是否由國民黨所指派和操縱的國民大會來決定，或者其他黨派是否在制憲大會之代表選舉和討論中，都有發言權。」

這樣，赫爾利大使雖為他的態度辯護，但既然使蔣介石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單靠美國對於重慶政府的援助，這就鼓勵他對於共產黨和對於其他反對黨派採取毫不讓步的態度，那麼目前的美國政策，很顯然就減少了中國求得統一之機會了。而且這種政策，在軍事上並非有利於美國從事對日的艱苦戰爭，美國在最近將來將在中國海岸登陸，以對日本在大陸上的主要工業中心進攻，需要與華北的游擊軍隊合作，是很明顯的。可是根據赫爾利大使之報告，美國政府現在是處於這樣的地位，即美國只冒有着與重慶公開破裂之危險，才能採取武裝這些游擊隊之步驟。

在事實上，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美國軍事將領已經放棄史迪威將軍早就提倡的主張，即中國軍隊在最後打敗日本中起重大的作用，只有這樣假定，才能說明為什麼決定不武裝游擊軍隊並把美國的軍事援助限於訓練和武裝華南的中央軍隊底特遣部隊，這一個新政策之理由，大致如下：必需在中國大陸上打敗日軍，主要戰場將在華北，日軍將在華北拚命抵抗，以保衛滿洲和高麗——主要工業中心與水陸進攻日本本土時的理想根據地——去的通路，可為中國軍隊如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訓

練，是不能完成打敗日本之任務，而美國人民却不願支持持久的亞洲戰爭，如此，就必需使用巨大的美國軍隊以迅速幹完這一工作。美國報紙時常提出在歐洲戰爭結束之後要從歐洲運大批美軍前往太平洋，這可以假設說是要使美國人民聽慣了這樣的主張，即在陸上進攻日本，美國是要負主要負擔。

主張爲了迅速而勝日本，不把中國軍隊當爲戰爭中的一個主要因素，當然是能够說的入情入理的，而且這樣的政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用不着克服重慶對武裝共產黨所領導軍隊之反對。在另一方面，此一政策却對於最近將來和戰後時期確有極嚴重的不利：第一、如果給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以最低限度的裝備，他們沒有疑問的將能給我們以有價值的幫助，這個意見爲一切到過游擊區域的外國觀察家所共有，而三月間由中國返美的國務院外交官路登強有力的重新提出這個意見。路登先生報告他一軍事情報單位在共產黨統治區旅行了七個月，說有六十萬訓練得很好的共產黨軍隊不斷對日進行游擊戰爭，他說共產黨缺乏供應品，但「他們所得到的任何物資都能使用得很得當」，他也強調「共產黨到處得人民擁護，而這是規模太大了，決不過是裝樣子給外人看的」，「根據路登的意見，八路軍是「被人民所運重的，人民認爲他是在這個廣大地區中的軍事和政治的中心力量」。

當魏特梅耶將軍與赫爾利大使在華盛頓發表他們對於中國情況之見解時，國務院容許路登先生對記者發表其正式的意見不是沒有意義的，也許是表示國務院並不是全體同意赫爾利大使在他之無保留的爲重慶政府辯護這一點上對中國情況之處理方法，如果美國因爲順從了重慶的情感而不援助游擊軍隊，顯然就不僅使美國軍事在戰爭中失去了有價值的幫助，而且也會引起九千萬人民之反感。這九千萬中國人，已經在游擊區域建立了真正人民政府，他們所宣傳的目的，較重慶的反動官僚所抱的目的來得更與美國利益相適合。